

年轻人的 共鸣

2012年年初,《金融与发展》采访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六位年轻人,他们身处不利的经济环境,正试图加入劳动力大军。

我们又重新采访了他们之中的四位,分别来自波斯尼亚、埃及、日本和美国。我们未能与秘鲁的阿迪莫尔·加西亚联系上,他已经从秘鲁北部的山区搬到了位于首都利马郊区的一个贫民区,谋求就业机会并接受一些教育。他失去了玻璃切割作坊的工作,并在2012年开始寻找半日制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留出上午或下午的时间去上课。我们也没能联系到生活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切尔玛·尼瓦萨耶,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寻找工作,同时她已经决定读研。

以下是我们所采访过的四位年轻人生活中的最新进展。

在波斯尼亚找到一份理想工作

阿玛·波拉希克-休曼,2009年毕业于萨拉热窝大学法学院。她在2013年3月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但在此之前她用了4年的时间求职,投出了385份求职申请。

28岁的波拉希克-休曼对于在萨拉热窝市法院找到的这份工作非常开心,她说据她所知,还有许多年轻人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波黑的失业率高达45%,居欧洲之首。根据波斯尼亚劳动和就业局的数据,如果将非正式经济中的工作者计算在内,失业率则将降至27.5%。

她说,“当同事打电话告诉我,我被任命为萨拉热窝市法院的专业助理时,我觉得这是在跟我开玩笑”。波拉希克-休曼在找到这份工作的一年前通过了司法考试,

但当时没有任何工作机会。

“在那段时期,我不断地投递求职信,做完了法学院毕业后求职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我通过了司法考试,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当时真是感到绝望,并陷入抑郁之中,”她说。

波拉希克-休曼在网络上或各家公司网站上找到大部分招聘广告,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投递求职信,这占到她投出的求职信的90%。可是其中大部分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她觉得自己的求职之路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她不是出身于一个有权势背景的家庭,也没有任何政界的关系。她为自己纯粹凭借自身的素质和技能被选中而感到自豪。“在进行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根据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询问我对某些法律对策的观点,这重新唤起了我对法律制度的信心,”她说,“他





们认可了我的抱负以及我对获取必要知识所付出的努力，对这一点我感到开心极了。”

她所供职的部门是处理法院判令的执行，主要是针对萨拉热窝市政公司未偿付账单的催收。由于预算紧张，她是办公室中唯一一名专业助理。“我工作非常辛苦，但我从不抱怨。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感觉个人价值得到完美实现，我非常高兴。”

她认为，多年的求职之路帮助她培养了耐心和谅解的能力，当她面对不能支付账单的各种当事人时，这一点对她有所助益。“由于我能了解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中，存在着社会不公和贫穷的现状，我能够妥善地处理每一桩案件，或许也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来介绍案件，”她说。

“我和不同职业的人都聊过，比如护士或者IT专家等，他们无法在其专业领域找到工作，这着实令人气馁。”

明年，波拉希克-休曼可以申请去做法官。她表示，希望自己的个人素质和勤奋工作能够得到遴选委员会的认可，不过，她也说如果第一次申请落选的话，她不会感到失望。

波拉希克-休曼在2014年12月结婚，现在小两口住在她最近购买的一套公寓中。她采用了20年按揭贷款的方式，每月还款额几乎用去她月工资的一半（1200波斯尼亚马克，相当于754美元）。不过，她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国家发的正式工资，”她说。她预计一旦成为法官，她的收入还有上涨空间。

尽管波拉希克-休曼对在波黑的状况感到满意，她说她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希望走出去。“我和不同职业的人都聊过，比如护士或者IT专家等，他们无法在其专业领域找到工作，这着实令人气馁。即便他们对整个国家的运转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国家并未努力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她说。

波拉希克-休曼认为，劳动法是导致大批年轻人纷纷离去的主要原因。如果养老基金能够得到加强，年龄较大的工作者就可以退休，为年轻人留出空缺。

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坚持是唯一的出路；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这里的人们注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想要的东西，用自己的实力、通过自己的方法来拼杀奋斗。以我本人为例，我得到了认可，我所能向大家给出的建议是，坚定决心，奋力争取自己的权利。” ■

撰稿：达莉亚·斯图-苏西科（Daria Sito-Sucic）；
摄影：达都·路维克（Dado Ruvic）

埃及纪录片获奥斯卡提名

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了为期18天的革命运动。然而，艾哈迈德·哈山从来没有想到他在革命中费尽心力所摄制的视频短片会如此这般地改变他的生活轨迹。哈山遇到了一位埃及裔美国电影制作人——耶海恩·诺杰姆，他们两个人都扛着摄像机记录下革命的每个瞬间。

他们将视频短片制作成为一部未经删节的纪录片，片名为《广场》，诺杰姆担任导演，哈山既负责摄影，又出演主要角色。该部纪录片讲述了埃及革命的经过——从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到2013年新选总统穆罕默德·莫尔西的继任。《广场》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提名。

尽管《广场》没有获得奥斯卡奖，但是其国际影响力（奈飞公司自2014年1月开始提供该片的在线电影）使这位中产阶级年轻人一夜成名，尽管埃及的当权者试图在本国内对其进行打压。

“审查机构没有批准该纪录片在影院上映，但是影片还是通过YouTube流传出来，而且盗版CD在路边就可以买到，”哈山说，“我们确实没有从这部影片挣到钱，但是片子家喻户晓，有些名气的咖啡馆还举办该片的放映专场——我会收到参加这些放映会的邀请，我简直无法描述我的喜悦之情。”

2014年8月，哈山以其为《广场》一片中所做出的工作获得了美国国际电视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艾美奖，成为了首位获得该项大奖的埃及人。

不过，哈山并不太情愿成为明星和领袖。“在埃及革命之后，年轻一代试图鼓励我让我在媒体上为他们讲话，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担任领袖的合适人选。除了我过去在埃及私营和政府媒体中担任一些职务之外，我更喜欢不抛头露面的方式。媒体中露面的每个人都会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而我更愿意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工作。我购置了摄影和剪辑设备，并开始培养我的专业技能。”

哈山说，他对其未来并未设定长期目标。“我喜欢活在当下，”他说。他目前是一位独立导演和摄影师，正在拍



摄和剪辑另外一部有关革命的纪录片。他的另外一部有关政治犯的电影也即将杀青。本片中的女性领袖人物是积极分子萨娜·阿普杜勒·法塔赫，也是他的密友之一，她因抗议被定罪，并于2014年年底被判三年监禁。

哈山表示，他对于埃及的民主变革没有失去信心，不过他说变革进程缓慢以及埃及总是重蹈政治失误的覆辙令人感到困扰。

他还表示想要留在埃及，不过他希望能在国外居住一小段时间。“我从未想过要移民。现在，我正在寻找在英国或美国任教一年或两年的机会，希望能有好运。我想，这会为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一个大的转变。”

哈山说，新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其职业生涯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速度对我而言很有帮助。我会对重大事件

以及冲突等进行拍摄，然后将其上传至 YouTube，视频会获得数万次的浏览量，这也是我获得成功和知名度的一大原因。”

他的艺术成就为他带来的经济回报也很丰厚。“我每月的收入已经增长了很多倍，我现在居住在城市（开罗）中心地带自己的房子里。”他将自己的老房子给母亲和姊妹居住，并为她们提供资助。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的财务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不过，目前我还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也许还要再等几年吧。” ■

撰稿和摄影：希沙姆·阿拉姆 (Hisham Allam)

在日本，向前一步，退后两步

对于佐藤拓实来说，这几年 IT 行业就像一部过山车。上次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努力应对着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后来他失业了，现在他感觉自己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佐藤的父母对他十分关心，一直劝说他在位于东京东部自己的家中多住些时间，但佐藤还是表现得非常独立，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东京北部郊区川越市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

26 岁的佐藤说，他决定依靠政府每月援助的大约 1,000 美元来度日。“我必须精打细算，不过我现在也习惯这样了/每个月我都努力做到能剩余一点点作为储蓄，”他说。

佐藤的生活一度曾经出现转机。他与一家制作电视动画和视频节目的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合同，尽管合同没有续签，但他很快又在另外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半年的差事，这家公司是为超市和便利店准备便当午餐的。但之后由于佐藤先前曾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自闭症类群疾病）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鉴于他的心理健康出现恶化，医生建议他辞掉工作。恢复健康之后，佐藤加入了日本政府的就业服务中心——“你好工作”，他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几乎马上就在一家生产智能手机和在线游戏的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就像梦想成真一样，因为这正是我想找到的那类工作，”佐藤说，他毕业于技术专科学校，主修计算机游戏设计和制作。

不过，佐藤这次签订的合同还是六个月的可持续展合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者目前都面临这种局面，而之前他们所享受的是与本国公司签订终身工作的就业模式。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经济衰退之后，这一体系逐步式微。

“他们告诉我，我能够在完成前六个月工作之后获得全职员工的身份，”佐藤说，“这意味着在这六个月当中我无法获得正式员工的所享有的任何待遇，这六个月让人感



觉非常漫长。”

压力开始产生不良后果，佐藤出现睡眠问题，上班常常迟到。公司多次警告他需要按时出勤，但是这使情况变得更糟，佐藤说。佐藤的医生诊断他有睡眠障碍，后来公司跟他履行完毕六个月的合同，也支付了他工资，但没有与他续签。

他目前处于失业状态，并在进行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我真的想去工作，”他说，“我想找到一个能够全盘接纳我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目前正在向别人寻求帮助，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富有效率的员工。”生活中的所有其他方面，从交友到建立自己的家庭，都处于停滞状态。“我无法工作，那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位生活伴侣并为家庭提供保障呢？”

佐藤似乎对他的困境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有在提到日本的政治形势时他变得活跃起来甚至有些气愤。“安倍经济学没有为我和上百万像我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他说，并提到了首相安倍晋三通过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和结构性改革来强化日本经济的种种努力。

佐藤说,安倍的政策扩大了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他在帮助那些已经拥有一切的人,”他说,“就是那些富人、大公司和老年人。而像我一样的年轻兼职员工、失业人员或者忍受病痛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和权利。”

2014年11月,安倍为下一个月召集了一次紧急议会选举。

佐藤说在12月份的选举中他将票投给了日本共产党。而安倍的自民党却轻松当选。■

撰稿:朱利安·赖亚尔(Julian Ryall);摄影:阿尔菲·古德里奇(Alfie Goodrich)

美国的另类人士

社会活动家亚历克莎·克莱感到有些失落和迷惘。部分原因是文化冲击她最近从柏林重返华盛顿做短暂停留,现在她把柏林称为家乡。她说,美国首都生活的疯狂节奏以及对工作的痴狂再次令她震惊。

她感觉迷惘的另外一个原因更多是关乎存在的。克莱花费了大部分时间思索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本主义要走向何方?最后仅存的这个超级大国将何去何从?在统一的大超大型公司中如何推动富有意义的变革?

两年前当《金融与发展》采访克莱时,她就职于一个非政府机构,当时正忙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华尔街贪婪性的厌恶为运动推波助澜,而且当时看似这种运动会持续下去。但事实上,占领运动失去了动力并基本上淡出了公众视线之外。

两年之后,克莱承认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满怀希望。“事情实际上[要比我过去认为的]更加复杂。可以说,现在我做着同样的工作,工作也同样勤奋,但变革的发生确实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看到的那样迅速。”

占领运动之后,克莱将自己重塑为她所自称之为的“文化黑客”,并对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陶醉不已。她的网站将



自己描绘成为“首席另类”,其秉承的目标是“重构资本主义精神,每次针对一个另类人士”。

“另类”这个概念可能比较清晰,但什么是“文化黑客”呢?“我的父母都是人类学家,所以文化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相当重要的。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我们也可以主动去塑造文化。而“黑客行为”是指了解相关系统并进而对其进行改变。黑客知道如何对系统进行分解。他们了解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这是很紧急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忠诚是为了某种更大的利益。”

作为她的文化黑客行为日程的一部分,克莱帮助成立了“内部创业者联盟”,该联盟为那些希望从内部实现业务转变的大型组织机构的员工(她本人将其称为“小屋勇士”)提供同侪支持。

她举了一个例子,第三代汽车行业员工戴维。戴维的目标是促使其供职的公司除其生产汽车的主要目标之外重新思考城市交通问题。

“对于像戴维这样的人,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次时长为一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他作为社会内部创业家的身份:他是大赦国际的成员,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将所有这些其他元素融入了其工作之中。许多其他人可能没有他这样的勇气在工作场所做到如此真实。”

“我们在与他谈过之后,进行了首次人员召集,我们召集了20位我们感觉符合这一描述的人。我们让他们彼此之间见面。之后,进行了一次全球性的竞赛来获得更多人员加入网络。”

克莱的工作需要进行许多谈话不过对于她来讲交谈、联络、讨论和交流思想本身就是目的之所在。克莱这位文化黑客在其网站上写道:“我将谈话作为了解全球状态的工具。我利用交谈来寻找关联,发挥作用。”

不过,一位女性无法仅依靠谈话生活,克莱在过去两年中的游牧式生活方式是靠公共演讲、咨询和写作等活动来提供资金来源的。

基于她对社会上另类人士的颂扬,克莱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付梓出版,书名为《另类经济》(The Misfit Economy)。该书考察了在地下和非正式经济中的创新者,即书名中所说的“另类”人士。

克莱给出的另类人士示例包括那些令人讨厌的索马里海盗和毒贩以及嘎嘎小姐,她将这些称为将“另类情绪”进行利用的另类人士。这种描述对克莱和对嘎嘎小姐来说可能同样恰当。■

撰稿:康铉成(Hyun-Sung Khang);摄影:迈克尔·斯比罗特洛(Michael Spilotro)